

隨筆・觀察

說不盡的複雜曲折

• 黃仁宇

《達遞魯士》(*Daedalus*)讀來不順口，卻是美國藝術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所主持的季刊。一天早上該刊的一位副編輯來電，徵求他的同意，摘錄他所著《中國的大歷史》書內頁259裏的文句一段，印在春季號的封面內頁，作為該期「中國在轉變中」("China in Transition")的台辭，本來這也是好事。《達遞魯士》雖不是暢銷雜誌，卻有它的特殊的色彩與地位。聽說這期還有多位名人執筆。他雖在睡後初醒，立即承允。

「好吧」，他說，「你寫封信給我，寄我一塊錢，我就把採用權賣給你。」

這也是通常一般辦法，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凡事恐口無憑出錢為證。多年來他自己所著書借用旁人智慧財產的地方或者旁人借用他的地方也都如是奉行，百無一失。有時沽價還有點經濟價值，有時則只有形式，表示只賣不送。

不料這位副編輯文教習慣濃厚，

倒不樂意用這種市儈辦法。「你真的要一塊錢？」她繼續再問下去：「我們是不是須要訂一個合同？我送你一本雜誌好嗎？」

他這時已頭腦清醒，深恐誤會。“Sure”，於是就這樣決定了，不訂合同，沒有美金一元的額外收入，拭目以待《達遞魯士》春季號，她說在五月底左右出版。

其實他最近所作文也像達遞魯士，也就是說不盡的複雜曲折。這樣也妨礙他與朋友間的稿約。任編輯的朋友希望他來稿，只新穎，不重複。字數三四千最好，最長頂長也無逾五千字。他一寫就是一兩萬言，並且夾雜囉嗦，當中也免不得舊調重彈，給編輯朋友徒增煩惱。

* * *

達遞魯士乃希臘巧匠，因事從本國逃入克里特島，他替國王設計製造迷宮(Labyrinth)，內中有無數複雜曲

折，總之就是進去容易出來麻煩。這還不算，當克里特國王不許他離境時，達遞魯士乃與兒子同謀，用羽毛造成翅膀，以蠟溶貼肩背上飛出境外。不幸兒子飛得距太陽過近，陽光將蠟溶化慘遭跌死，達遞魯士乃得飛至西西里島不知所終。

藝術科學學院以達遞魯士為標榜，既有藝術情調，又沾染科學意義，可謂得其所哉。可是他卻無意參與製造迷宮的工作，無奈多少時候，複雜與曲折的因素纏綿而至，不由吩咐。他很早以前就想修練寫一點藝術文字，擺脫刻下的單調，以便效法先賢飛到西西里島上去終我餘年，至今未得如願。

* * *

可不是嗎？當日下午就收到台北編輯朋友轉來快信一封，一位讀者提出抗議，提出一個社會有高層機構者為馬克思；但是馬克思未曾說及尚有低層機構，遑論及上下間之聯繫。他的文字裏一來就比馬克思尚多兩層，無乃畫蛇添足。

本來上次他提到韋伯，也有人批評他講的不好，沒有本地權威講得剴切，幸有朋友救護。這位朋友就提出法國學者論資本主義時索性將韋伯擯之門外，結果並未因此而垮台。他對馬克思也有如是想法。馬氏生平未曾航空旅行，不知種族平等，未經歷過世界大戰，他對負債經營之知識不及今人之十一，總之就是與我們時代不同。要是我們事事向他老請教，所用辭彙也要他老校訂，那也就平白的出生在二十世紀了。

其實未收到此信之前，他又在下次書刊裏寫下下面一段：

我們所說創造高層機構，重新改組基層組織與敷設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繫的三重階段因缺乏近身事例，只能引用較遙遠的歷史解釋，有如魏晉南北朝既終，隋唐之間創造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興建國都長安，開始科舉取士，是謂創造高層機構。一般人民則經過均田與府兵的安排，是謂改組基層組織。又頒佈律令格式的四等文書與租庸調的稅制，是謂敷設上下間的聯繫。再如英國在十七世紀經過光榮革命確定了議會至上之原則，開始引入兩黨政治，並且設立公債，由英倫銀行主持，是謂革新高層機構，又擴清了「副本產業」(copyhold)的意義使土地領有規律化，是謂調整低層機構。更在普通法庭施用衡平(equity)原則，使民事刑事訴訟注入商業社會習慣是為重訂上下層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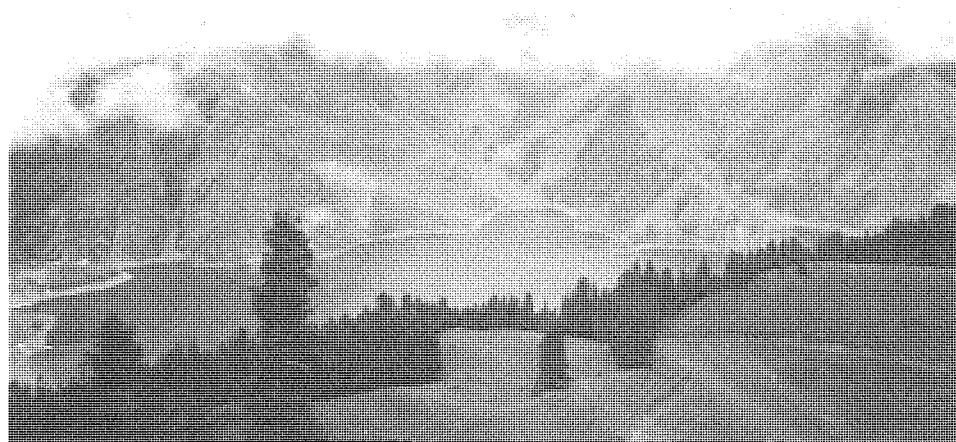
可是如此這般字數就多了，也免不了夾雜囉嗦，然則要不如此，對很多年輕的讀書人沒有交代。更怕將他們誤領入歧途，弄得考試不及格，更覺歉罪。

* * *

郵件裏又有北京《讀書》93年1月號，這刊物已將內面紙張外面裝璜整個的刷新。首先引起他的注意乃是一篇文字題為〈坐視世界如恒沙〉，帶着副標題正是介紹他的大歷史觀。

「自我愛慕」(Narcissism)乃人之常情，此時看到自己六年以前所寫的文句，已能和大陸的人士見面也深覺得欣慰。

.....構成一種可以在數目字上管



理的目標之下，一定要考究這種體制帶有多少資本主義的色彩，是否夠得上稱為社會主義，或者是否與共產主義衝突，在我看來這些問題大部已屬於摩登學究的領域，與實際情形已無具體關係。

……如果朝野人士對一時一事作政策上和具體上的爭辯，還講得通，要是劈頭劈腦，猶在整個輪廓上以主義為名，堅持我個人理想上空中樓閣之整齊完美則為不智。

也真想不到反對姓資姓社的辯論，今日在北京已為公論所容，而在台北偏有人自奉得馬克思衣鉢真傳，不容別人修訂。

* * *

他又接到香港一位朋友寄來一篇演講辭，演講在今年三月，地在廣州白天鵝飯店。這位先生乃是一家跨國公司的總經理，主要的工作在對食物

加工推銷遠近各地。去年他的公司和北京郊外一處榨黃豆的工廠合資經營。香港公司提供新機械、新管理方式。根據協定它有對全廠員工的人事權，被辭退的員工則由本地原有廠方負責善後。港方派往的經理人員視察兩個月之後，決定保留原有工人百分之六十，工資待遇加倍，管理員工加薪晉級三四倍不等。這樣打破了鐵飯碗大家都吃大鍋飯只顧思想前進不管工作效率的積習。可是決定一宣佈即有被辭員工約二百人聚集廠前，準備妨礙作業。

也真料不到解決此糾紛的乃是本地共產黨支部的書記，他和辭退的員工講到國家需要現代化的必要步驟，說得眾人無法支辯。他又就此安排，由公家花一筆退休金令各人解業做個體戶。倘非如此，工資與價格的改革永遠無從着手。

這位先生的公司又和山西一家葵花油廠合作。葵花出油之外，榨餘作為飼料可以在海外推銷。兩方訂合作

協定的時候港方要求山西省計劃經營的單位負責經常供應葵花子，又由人民銀行的山西分行出名擔保，如果銀貨延誤，即算違約應收科罰。

果不其然，中國官僚機構的積習難返。第一批應交的葵花子到期未交，負責人各有藉口，第二批又延未交付。及至詢問則推說港方所裝置的機器不靈。港方也認真的派了一位工程師率領機械員工浩浩蕩蕩的往山西查勘，發現機械全部完好，而是儲油子的庫房空空如也。原來新產生的市場經濟已把農作物的價格提高，計劃經濟的部門所訂價格無法購得如數的葵花子。及至詢問人民銀行，又另有推諉，於是港方公司只能向北京仲裁法庭提出訴訟。結果勝訴後港方公司除收回本利之外尚贏得一筆相當數目的罰款，抵償爭執中的損失。

這些小故事的意義何在？

所述亦即是幾年來所提倡敷設上下之間法制性聯繫之真象。過去有如隋唐，一紙通令，全國通行，總之即專一雷同。今日則量才授職，只能從實踐的場合裏決定。英國在十七世紀改為商業體制時也採如是這般的辦法，所有權力與義務，大半由法官判案的時候決定，亦即由司法機關立法。

在這當中也隱現着一個新型經濟體制無所不包、毫無遺漏的態勢，以英文說來此即 inclusive and exclusive，這種趨勢繼續發展，終至所有的經濟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於是全國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至於何種成分屬於資本主義的性格，何種公式符合社會主義的精神已屬次要。

目前中國當然沒有將一切問題解決。他的《中國大歷史》也明白寫出：

「我們說中國經歷到一種突破，無非某些障礙業已排除，過去很多不能做的事，現在能做。」這與理想仍相去至遠。即使前述以香港作基點的跨國公司之總經理先生也在他的演講裏提及要組織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勢必還要在科技方面作新的突破，只依存於現有的西方科技，還是不夠。

* * *

再翻開來件中有一位國際漢學家發表的談話，說是刻下中國大陸的情況又恢復到1930年代裏去了。本來這也說得言之成理，當年蔣介石在南京大興土木，氣象萬千，上海則酒綠燈紅，今日眾所周知的阮玲玉也在那時成名，況且各種刊物各種劇團都如雨後春筍的出現，今昔皆然。

這種說法只有一點小毛病：

1930年代，外強在上海漢口天津各處有租界、有領事裁判權、有內河航行權，海關由梅樂和爵士掌握，外匯匯率由匯豐銀行決定。於是內外之間造成無形壁壘。受到國際貿易的好處無乃通商口岸，高級華人。社會學家費孝通就指出中國城市實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橋頭堡(bridgeheads)，與中國鄉村間有長遠之距離，未若西方城市如紐約、倫敦，城市鄉間為一元。

因為今昔之不同作為一個歷史從業員的他才覺得中國在二十世紀經過一段亘長而大規模的革命並非虛語。今日從廣州灣到黑龍江各大城市的工商業全有鄉鎮工業支持。各位只要從廣州僱計程車行車至珠海則見有些五金及零件工廠開設於道旁田野之間，有些小山已被挖出一大半，有人說這是人類史裏最大的一次興建。說他固執也好，說他「自我愛慕」也好，他對

這些現象確有主見。

中國的長期革命範圍之大，超過隋唐，性格上卻依稀相似於英國在十七世紀的奮鬥掙扎，主要的目的在將一個農業作主的社會改為一個以商業為主體的社會，此中之過程有等於脫胎換骨。

為甚麼過去中國有很多不能做的事情今日能做？

各位試看《李宗仁回憶錄》，李將軍說及當七七蘆溝橋事變時他奉蔣介石邀請去南京，首先即有雲南的龍雲與四川的劉湘的反對，他們都勸他不要前往。及至後來稱團結抗戰，實質上也仍是「八國聯軍」，李指揮台兒莊戰役前後，死在滕縣的王銘章則屬四川軍，守台兒莊的孫連仲原屬西北軍，繆徵流為東北軍，廖磊為廣西軍，只有湯恩伯才算中央軍。不僅各軍編制裝備戰法不同，而且人事經理也各有系統，廣西尚有它自己的徵兵辦法。李宗仁以戰區司令長官的資格接見龐炳勳軍團長時還說：「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應該指揮你……」

李後面還有蔣介石的主持。當日的軍令軍政軍訓軍法與軍需當然也是草創伊始。新中國的高層機構卻是在這種情形下拼成。

一提到毛澤東，各人心目中只有「痞子政治」（毛自用語）和文化大革命等等壞印象。很少人會想到他與中共構成人民公社之後大家都穿藍布襖吃大鍋飯將農作物低價由政府收購，又配給城市居民，以壓低工資，幾十年閉關自守，於是才存積得一段國家資本。據估計三十年內，農民所貢獻的部分就值人民幣六千億元。無疑的今日北京黃豆廠被裁員工的救濟費直接間接由此存積的資本支付。如果沒有

當初的那段苦幹則缺乏現代經濟之基礎，無庸談及今日之改革。

這亦是歸功於毛澤東翻轉低層機構的由來。

* * *

他已將來件分別擱置或投入字紙簍。信筆寫來，好像又已超過所限字數，仍苦於限於篇幅無從介紹新穎資料。伸起腰來，他已覺得肢體與眼光頭腦之遲鈍。他自己是老人，卻對老年人不耐煩。他只希望將自己的一段看法傳達到年輕人心目中去。他所謂大歷史也無非簡化迷宮中的細節，使後一輩不致在縱橫曲折中迷失方向。或者他們之中仍有有志之士覺得組織中國的勞動力中有無數的工作待做，也有無數的機會。總之就「獨樂樂不若與眾」。

他當然不反對飛向西西里島上去，因為他自己也準備在飛。只是不要忘記，翅膀由蠟膠成，遇熱溶化，有墮地的危險。

黃仁宇 1918年生於湖南長沙，當代中國著名歷史學家，以倡導「大歷史」（macro-history）史觀而備受國際學界推崇。五十年代赴美國密西根大學攻讀歷史，獲博士學位，先後於南伊利諾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等校任教，並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黃教授著述甚豐，曾參予《明代名人傳》、《劍橋中國史》之撰寫工作，專著則有《中國的大歷史》、《萬曆十五年》、《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等多種。